

# 瑞典高等教育政策 轉變之分析

陳芳吟\*

## 摘要

瑞典是公認福利體制最完善的國家之一。福利國家的建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先進國家的主流，其所強調的價值與理念的轉變牽動到各種政策的調整，也對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影響。1980年代新右派的快速推展以及經濟全球化，「從搖籃到墳墓」都有完整社會照顧制度的瑞典也無法避開改革浪潮。本文透過文獻分析，探討瑞典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與轉變，並分析影響高等教育政策發展的重要因素。從中本文發現政治經濟的變動、福利國家的意識型態、以及全球化與市場化的力量均是影響瑞典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政策的轉變，高等教育也從福利制度中的一項，轉變成解決失業與經濟問題的主要工具，福利國家的意識型態並未隨著政策的改變而消失，國家在高等教育發展與政策引導上占有重要位置。

**關鍵詞：**福利國家、瑞典、高等教育

---

\* 陳芳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博士班學生

電子郵件：feliccia@ntpc.edu.tw

來稿日期：2012年9月5日；修訂日期：2012年11月5日；採用日期：2012年11月16日

#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in Sweden

Fang Yin Chen\*

## Abstract

The welfare state is the mainstream in European countries after World War I. The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is ideology affect many policies, including tho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1980s, as a result of the neo-rightism and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ost countries had to adopt a series of policies which adjust the welfare state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Sweden, known by its comprehensive social care system, cannot avoid the imp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Swedish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by virtue of literature analysis. Higher education used to be one welfare item of the welfare state. It has turned into a major tool to improve 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lve the unemployment problems. In addition, the nation keep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polic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process.

**Keywords:** welfare state, Sweden, higher education

---

\* Fang Yin Chen,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E-mail: felicia@ntpc.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September 5, 2012; Modified: November 5, 2012; Accepted: November 16, 2012

## 壹、前言

二次戰後福利國家的建立成爲西方先進國家的主流，但不同國家由於其不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歷史發展背景，其社會福利措施與福利國家結構也有所不同。Esping- Andersen (1990) 用去商品化 (decommodification) 的概念，將福利國家分爲三類型 (引自鄭秉文譯, 2003) :

第一，自由主義福利體制 (liberal regime) : 此類國家的典型代表是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洲。此種模式認爲最理想的社會階級結構必須建立在自由放任的政策與制度上，自由市場制度應主導社會各階層的福利關係。爲解決市場失靈所帶來的不平等，國家一方面提供最低及有限的給付補助，且給付對象有嚴格的規定，只提供給低收入戶；另一方面，國家則補助私人部門提供福利服務。國家運用上述兩種手段，促使市場機制發揮功能。

第二，保守主義福利體制 (conservative regime) : 奧地利、法國、德國和義大利是其代表。此種體制深受統合主義式 (corporatist) 政治體制的影響，國家與各種行會社團結合，掌控重要的決策與利益，因此爲維持社會階級地位的差異，國家取代市場成爲福利的提供者。此外，由於受到教會的影響，此種類型的國家十分重視保護家庭關係，強調國家對家庭的輔助性角色，只有當家庭不具備功能時，國家才會進行干預。

第三，社會民主福利體制 (social democratic regime) : 瑞典和挪威等北歐國家爲典型代表。此模式將市場排除在外，其目的在追求每位公民最高的平等，強調建立一種普遍而廣泛的福利體制。此體制的特點是融合福利與就業，一方面保證充分就業，另一方面以就業所獲致成果來支撐巨額福利支出。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對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高等教育也無法倖免。1980 年代以來，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新公共管理運動、以及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脈絡下，世界各國高等教育均進程度不一的改革。相較於自由主義福利體制與保守主義福利體

制的福利國家，私有化與市場力量的介入對社會民主福利體制衝擊更大，社會民主體制與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價值理念大不相同，兩者之間的矛盾也使得社會民主體制的福利國家在變革中受到的影響與改變的幅度不同於其它體制的福利國家。

瑞典即是社會民主福利體制最典型的代表。瑞典政府採取積極性的勞動市場政策，將福利與工作結合，政府承諾與支持充分就業，人民須繳納較高額的賦稅，由政府提供津貼，負擔人民大部分的住宅、醫療、教育等成本，是一種較強勢干預的國家政策。依循福利國家的原則，瑞典的高等教育發展也不例外，政府將高等教育視為公部門，不管在人事、經費、課程等都歸中央政府直接管控，因此瑞典高等教育政策在本世紀前半期幾乎沒有改變（鄭秉文譯，2003；Premfors, 1979）。

瑞典高等教育第一波的擴充開始於 1960 年代後期，前所未有的擴張與政治經濟的不穩定，促動各種改革政策的提出，這股波動破壞原本建立的結構，開始重塑高等教育機構根本的運作方式。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重創瑞典的經濟，也影響其政治的穩定，1976 年執行長達 40 年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下台，也帶來瑞典高等教育的第一波變革。瑞典高等教育從 1960 年代末期的福利國家到 1980 年代時，受到國家經濟政治、全球化、新公共管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開始走入市場；1993 年瑞典的高等教育政策從中央計畫性的管控，轉向解除管制、私有化與績效經費補助（Bauer & Henkel, 1999; Niklasson, 1996; Premfors, 1979）。本文旨在透過文獻分析，探討瑞典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與轉變，並分析影響高等教育政策發展的重要因素。首先敘述瑞典福利國家的背景脈絡及高等教育的概況，其次，探討瑞典重大高等教育政策三個階段變革的內涵，最後討論瑞典高等教育的發展。

## 貳、瑞典政治歷史文化背景脈絡

瑞典是制度式福利國家的代表，其社會福利的演進從十六世紀奴隸的解除即開始發展，具有綜合性、制度化、團結與普及的本質，（林

萬億，1994）。十九世紀的瑞典仍是個農業國家，其工業化始於十九世紀七〇年代，工人成爲社會結構的主體，工會組織也隨之成爲推動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特別是 1889 年社會民主黨的成立，標誌瑞典政治與社會文化的新階段（王云龍、陳界、胡鵬，2010）。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對瑞典經濟與社會生活造成重大的打擊，社會民主黨開始在人民要求建立真正的議會民主制度中壯大，在 1921 年的憲法改革後，瑞典的政黨逐漸分爲自由黨與社會民主黨兩大陣營。自由黨主張保護私有財產和自由企業制度，而社會民主黨主張自然資源與工業國有化，但兩大黨皆無法在議會形成穩定的多數。爲解決戰後的經濟大恐慌與新技術所帶來的大量失業人口，社會民主黨提出通過國家干預，實行通貨膨脹計畫與積極的勞工市場政策。1932 年，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首次合作取得國會中超過半數的席次，時任社會民主黨主席漢森（Per Albin Hansson，1885-1946）在 1928 年的國會演講提出「人民家園」（Folkhemmet）理念，即由工會和企業共同協議建立一個社會與公共健康的保障體系，該理念包括平等和公平、合作與互助、打破社會和經濟所造成的貧富與貴賤對立等，都成爲瑞典福利國家理念的經典，亦是建設瑞典福利國家的里程碑（引自王云龍、陳界、胡鵬，2010）。

瑞典的「社會民主模式」（social democratic model）或瑞典模式（Swedish Model）從 1933 年開始開展（林萬億，1994）。社會民主模式的核心理念主要表現在兩個核心價值：第一，社會包容，指國家要讓人民能盡自己的力量貢獻社會，國家應提供普及式的服務或給付，提供人民工作的機會，以促進社會平等和團結；第二，重視平等，即藉由對人民收入和所擁有的資源進行再分配，達到社會平等的目的。相較於其它類型的福利體制，社會民主式的福利體制更爲重視普遍的平等，將市場排除在外，強調建立一種普遍而廣泛的福利體制，融合福利與就業，一方面保證充分就業，另一方面以就業所獲致成果來支撐巨額福利支出（鄭秉文譯，2003；Esping-Andersen, 1996）。

從政黨的意識型態來看，左派的社會民主黨堅持民主、平等、互助的價值觀，主張政府應作爲一個「積極的管理者」，執政的重點在建構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與公共服務，解決就業、養老、醫療等各式

民生問題，反對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主義福利觀念，在教育上則強調提供從小學到大學的全民免費教育（林卡，2005；劉楓耘，2007）。社會民主黨以「人民家園」的理念連續執政44年，在年金、社會救濟、醫療保健、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改革目的在縮小階級差別，使人民享有更多的國家福利和均等機會。

二次戰後，瑞典大力擴張其自三〇年代以降即已鋪路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戰後社民黨的政策主要立基的是充分就業，主張由政府規劃經濟政策發展，以確保分就業與平等分配，教育上開始進行學校體制改革，實行綜合學校制，所有教育皆免費提供，設立政府基金，支持高等教育機構進行研發工作。1960年代初期，社民黨與共產黨利用在議會中掌握多數席位的優勢，公共部門的社會福利迅速擴張，教育、醫療保健、老年年金、和住房津貼均由國家給付，教育與健康照顧受益最大（王云龍、陳界、胡鵬，2010；林萬億，1994）。1960年和1970年代瑞典所提供的完整性福利服務舉世聞名，儘管在1973年後開始出現經濟上的困境，但瑞典政府仍繼續改善福利供給的程度、範圍和品質，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開始轉變。

1980年代，一方面由於預算赤字的增加，另一方面則是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瑞典政府開始小規模的實施削減福利的措施。此外，由於公共服務的提供日漸受到大眾的批評，政府開始關注福利服務內所有公共服務的成本，私有化與分權化管理被政黨提出作為改革的工具（Stephens, 1996）。1970年代初，瑞典的福利制度被認為是最理想的制度，但瑞典經濟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許多問題，迫使社會民主黨放棄完全就業政策以及政府主導的福利制度，重新檢視其社會政策，主要的修正包括公共及社會支出，以及國家在扮演福利供給的角色。

## 參、瑞典高等教育的發展概況

瑞典高等教育自1477年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成立至今，已有500多年的發展歷史。早期瑞典大學的功能在於生產教育

的神職人員，以及提供國家所需的公務員（Svensson, 1982）。十九世紀末，瑞典即成立一些提供專業課程的高等教育機構，主要是自然科學領域，這些機構即為後來的大學學院，最早的大學學院成立於1878年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及1891年在歌德堡（Göteborg）。直至2005年，瑞典共有60所高等教育機構，14所國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22所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3所提供大學與研究所課程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及21所提供學士學位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包括3所護理學位、3所神學學位、2所藝術/音樂、13所物理治療學位，大學與大學學院的差別在於能否接受大學的研究經費及授予研究學位（Eurydice, 2009）。

瑞典高等教育的就學人數在過去60年來劇烈增加。1940年代大約只有2%的人可以進入高等教育就讀（Deen, 2007）。二次戰後，瑞典雖然已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但整體而言高等教育規模並不大。1960年代後學生數量開始擴張，政府為因應擴張的壓力，在1965—1975年間廣設大學學院，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開始大量增加。1980年代學生人數趨於穩定。1990年代高等教育開始第二波擴張，20-29歲就讀高等教育的人數比例從22%上升至33%；2000年後人數開始減緩大約為29%，至2006年25-34歲就讀高等教育的人數已達39%，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33%（OECD, 2008）。根據瑞典教育部的統計，到2007年為止就讀高等教育的學生數約為32萬人，各科系就讀以教育、科技、健康照顧等三大類別人數最多（Högskoleverket, 2009a）。

瑞典國家高等教育部（The 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設立於1995年，是掌管高等教育相關事務的主要機構，其主要任務在支持並確保高等教育機構的品質保證系統，負責實施全國性評鑑，審核與認可大學學院與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所提供課程及學位層級（Högskoleverket, 2009b）。高等教育的經費幾乎全由政府補助，學生就讀公立大學免繳學費，但須繳納註冊費給學生會，其中只有12所物理治療學校並沒有接受政府的補助，因此必須自行擔負學費（Eurydice, 2009）。

瑞典高等教育的學位結構自2007年7月1日開始，依波隆納

會議的共識分爲三個層級：第一層級（基礎層級），包括大學證書（university diploma）、學士學位（bachelor degree）；第二層級（進階層級），包括二年制及一年制碩士學位（master degree）；第三層級（研究層級）：包括碩士學位（licentiate degree，介於碩士與博士之間的一種中程學位），以及博士學位。每個層級各有其最低入學門檻，規定學生的學習成效和所應具備的能力（Hogskoleverket, 2009b）。

依照《高等教育法令與條例》（Higher Education Law and Ordinance）的規定，每所公立大學與學院皆須設置董事會，爲機構的最高決策單位，負責機構事務的管理。一般而言，董事會由 15 位代表組成，包括主席、副校長、7 位由政府聘任的代表、3 位教師代表、3 位學生代表（Eurydice, 2009）。2007 年通過《自主選擇法案》（Freedom to choose），賦予大學與大學學院有更多的權力決定其董事會成員的組成與聘任。

## 肆、瑞典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與轉變

Premfors（1979）指出，相較於瑞典其它公共領域，高等教育體系的規模、人員與經費相對較少，政策上衝突並不常見，直到 1950-1960 年代高等教育開始快速擴張，學生數量超過 3 倍成長，公眾對高等教育的注意力才隨之增加。因此，在 1960 年代前，瑞典高等教育屬於福利制度的一部分。1960 年代高等教育人數開始增加後，高等教育政策也隨之有了較大的轉變。依照瑞典重要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可分成三個階段：1977 年是瑞典第一次大規模進行的高等教育政策改革；1977 年後陸續有一些小幅度的法案修正，直到 1993 年，此是第二次較大規模的政策改變；1993 年之後，瑞典高等教育持續朝解除管制的方向前進。以下分述瑞典高等教育政策三個階段的轉變。

### 一、1960-1980 年——擴增與整合階段

高等教育的擴張是 1960 年代瑞典政府的政策要點（Premfors,

1979)。國家認為，雖然擴張必須投入大量的經費，但會帶來各種好處，包括經濟的成長、社會的平等、與文化的發展，政府相信這筆投資很快即獲得可觀的回收，因此政府開始規劃長期的計畫，藉由提供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滿足學生與勞動市場的需求。為解決學生數量增加所帶來的壓力，瑞典政府開始廣設高等教育機構。

在 1976 年前，瑞典的高等教育體系直接隸屬國會管轄，高等教育的發展反應國家、學校、教會、與司法體系的需求，負責訓練國家公務員，政府雖然嚴密管控高等教育機構所有的事務，但大學仍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1977 年通過的《高等教育法令與條例》（Higher Education Law and Ordinance），是瑞典第一次大規模進行的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主要由 1968 年執政的社會民主黨政府所成立 1968 委員會（The 1968 Educational Commission），先以理性規劃與中央化管理準則，研究整個後期中等教育的組織、規模與地理分布等問題，再於 1975 年五月提交高等教育法案（The Higher Education Bill）在國會中進行討論與決議，由於自由黨、保守黨等對法案中資源的分布與品質等議題有異議，因此 1975 年僅決議一個架構，直到 1977 年該法案才通過。

1977 年高等教育改革最大的變革是將原本大學、大學學院、機構與職業學院（vocational schools）四個高等教育系統整合為單一體系的大學系統（the Högskola），隸屬於中央教育與科學部（Utbildningsdepartementet），受到《高等教育法令與條例》管制。在這個單一體系下，只有大學能夠接受研究經費補助，學生與大學職員在各個層級的委員會獲得代表席次，高等教育的所有課程計畫內容與招生數量受到瑞典國立大學與學院委員會（National Swedish Board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UHÄ）的管控，大學課程的規劃更朝職業取向，提供學生更符合勞動力市場需求的技能，期望能提供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有公平就讀高等教育的機會。此外，原本由政府指派的大學校長在這次改革後，不同的利益團體，包括貿易協會、學生團體、學校各部門，皆獲得在學校董事會中的席次，除了教授的權力受到削減外，大學在決策上的自主性開始產生變化，機構領導者能發揮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也相對被削弱（Deen, 2007; Svensson, 1982）。

1977年瑞典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標在「公平分配」與「質量平等」。簡單來說，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所進行的高等教育改革被視為是一種福利（welfare benefit），著重在公平與分布（distribution）相關的議題。

## 二、1980-1993年——鞏固與鬆綁階段

1980年代開始，社會民主黨逐漸改變其中央管制的政策走向，朝向解除管制與權力下放的方式，以提高系統的彈性與效率，權力下放雖然也是1977年改革的項目之一，但兩者的概念不太一樣。Askling 與 Almén（1993）指出，在1977年的改革中，權力的下放指的是權力分配給董事會和委員會，並不是直接下放給學術人員（引自 Bauer & Henkel, 1999）。此時期的改革主要由於1977年改革實施以來，新的高等教育體制缺乏彈性而受到強烈的批評，政府開始關注大學教育的品質，要求徹底檢視教學體制並建議改進。Sander（1992）指出，政府原本意圖藉由改革使高等教育的就學機會更為公平，開放更多機會給勞工階級的子女，但實施後的統計顯示，改革卻帶來反效果，大學生中父母是勞工的比例從1977年以來反而下降，整體高等教育系統的品質出現下降。

1988年國會通過新的中央政府預算與控制系統法案，實施新的3年預算制，新的管理與改革理念開始引進所有部門，除了賦予機構更多的責任，也開始目標導向的管制，以及與績效結合的自主（Sarback, 2004）。1990年代學生數量開始持續增加，但入學方式仍然受到中央管制。1992年非社會民主聯合政府提出《大學與學院的建議》（Memorandum on independence of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colleges），該份文件成為引導1993年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根基。

1993年瑞典高等教育的改革先由組織的重組與改造開始，廢止監控大學課程的瑞典國立大學與學院委員會，大學在課程規劃上獲得自主權，成立高等教育部（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大學校長室（Office of the University Chancellor）、高等教育訴願委員會（Board of Appeal for Higher Education）。1993年改革主要目標包括：提升大學與大學學院的自主、提高品質及使資源的運用更有效率、增

加學生的教育完成率、協調大學與學生間的課程供需、成立大學內部品保機制的責任，改革的重點在於賦予大學校長與董事會更多責任與管理事務的權力，包括：內部組織、資源分配等。此時期的改革徹底縮減中央的權力，政府在人事組織、資源分配、課程內容等權力下放給高等教育機構，重要的改變還包括允許機構自行設立入學的標準及以績效為基礎的大學經費分配（Deen, 2007）。

1993 年的改革之前，瑞典政府採取一種信任的經費分配方式，政府依照大學生的數量與學位授予數以核發整筆經費，並未將績效與經費掛勾，而採取一種遙控的方式，監控學生入學數與畢業數，在研究經費的部分也是採取整筆核撥的方式，很少附帶任何條件。但這種信任為主的經費分配方式，從 1993 年即開始轉變，受到新公共管理強調績效責任的影響，及新自由主義強調成本效益及符合需求，經費分配方式改成 40% 根據學生入學數、60% 根據個別課程的完成率核撥（Sörlin, 2007）。

此時期瑞典政府在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將高等教育視為一種工具，不是為改革社會，而是為提高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一連串的改革建議被提出，包括更大程度的權力與責任下放，例如教育在內的福利服務，私有化與分權化的改革雖然逐漸被接受，但不管是社會民主黨或保守黨，依然認為要在國家管理與財政的支持下運行，顯現此階段的改革在鞏固與鬆綁兩端不斷調整的過程（Stephens, 1996）。

### 三、1994 年迄今——更新與轉變階段

1994 年社會民主黨政府重新執政，中央的管制力量有強化的趨勢。社會民主黨政府廢止之前，聯合政府以高等教育與研究品質指標提供的獎金制度，成立新的中央高等教育行政機構，以監督評核高等教育的績效表現。1998 年後高等教育機構董事會的主席不再由副校長擔任，改由政府來聘任，董事會的成員須包含一定比例的外部成員。政府一方面實施 6 年一期的品質監控計畫，另一方面運用資源分配作為手段，從 1977 到 1994 年，瑞典高等教育機構的治理可以說是從中央管理到市場再回到中央管制（Engwall, 2007）。

從 1994 年之後，瑞典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基於公立高等教育機構仍屬於政府治理的原則下，逐步解除更多的管制，高等教育政策的重點在提高大學品質、增加機構自主、提升國際化與研究能力。從二十一世紀初開始，政府開始提出一連串的高等教育改革法案。2004 年提出的《新世界—新大學法案》（New World-New University），除了受到波隆納歷程（Bologna process）的影響外，主要目的在維持國際競爭力。此法案將原本的學位結構改為三階段的學位系統，且實施新的學分換算方式，學位與學分系統的改革於 2007 年開始生效。此外，《新世界—新大學法案》對高等教育政策帶來重要的轉變包括開始對博士學生與非歐盟會員國的學生收取學費（Deen, 2007）。

2006 年六月代表 42 所高等教育機構的瑞典高等教育協會，公開發表一份聲明，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經費與更大的自主，號召更多私人企業提高對大學研究的經費投資，建議政府對企業或私人為研究所提供的經費或捐獻給予免稅的優惠。2006 年十月教育部長弗雷德里克（Fredrik Reinfeldt, 1965-）宣布將進一步去除大學與學院委員會的政治化色彩，降低強制力量的運作，借用如會計系統、行銷服務等商業治理模式，更朝向市場取向邁進（Engwall, 2007）。

2008 年《知識沒有疆界—全球化時代的高等教育法案》（Knowledge without borders—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Govt. Bill 2008/09:175），其目的在提升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包括提高學生與教師的流動、聯合學位、海外行銷高等教育（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09）。2009 年《今日與當代的學術界法案》（Academia for this day and age）（Govt. Bill 2009/10:149），從 2011 年一月開始實施，旨在使公共資助的大學與其它高等教育機構，在政府現行框架內增加更大的自主性，法案內容包括：解除更多機構內部運作的管制，除了董事會與校長之外，高等教育機構能自主決定其內部成員組織結構；解除教學職位的管制，政府將決定聘雇教師的評量標準與資格，教授的聘用由校長決定，高等教育機構在聘用其它類別教師的程序與教職升等上有自主權；除了學習階段劃分與學歷資格體系將維持原本的管制，政府開始放鬆其它部分的嚴密管控，賦予高等教育機構能自主依照學生與勞動市場的需求提供課程，政府不再設定第一層級與第

二層級的員額管制。政府認為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將使高等教育更能回應社會的發展，且有助於大學活動品質的提升，俾使大學在國際活動上更具競爭力（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0）。

## 伍、討論與結論

### 一、影響瑞典高等教育政策轉變的因素

瑞典高等教育政策從 1960 年至今歷經三個階段的發展，從政策內容的轉變可以發現瑞典的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受到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改變、福利國家的意識型態，以及國際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所影響。

#### （一）由左向右的政治因素

瑞典的高等教育政策歷經三次重大的轉變，分別在 1977 年、1993 年以及 2006 年。這三個時間點是瑞典社會經濟政治情況較不穩定的時期，也是開創瑞典模式的社會民主黨沒有執掌政權的時期。創立於 1889 年的瑞典社民黨對於瑞典國家的社會福利發展功不可沒，1932 年競選成功進入國會成為執政黨，開始長達 44 年的連續執政，雖然締造瑞典模式的成功，但是因為七〇年代的石油危機，造成瑞典經歷戰後以來嚴重的經濟衝擊，國民生產毛額從 1960 年代的 5.3%，到 1974 年已下降到 0.3%，加上福利開支的劇增、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失業率上升等因素，使得社民黨在 1976 年的選舉中首次失去政權，改由自由黨與保守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取得執政地位（徐崇溫，2007；Premfors, 1979）。此時期也是瑞典第一次對高等教育進行大規模的改革。

1982 年瑞典社民黨重新以「保障福利、重振經濟」的訴求重掌政權，為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政府開始減少社會福利不必要的支出。由於未能解決失業問題及提升經濟表現，使社民黨在 1991 年的大選中遭遇第二次的失敗。有別於社民黨的政策走向，1991 年保守主義政府採取新自由主義式的政策取向，強調自由化、私有化及結構調

整，削減公共支出，鼓勵市場和個人承擔起福利責任。這股新自由主義風潮也影響此時期高等教育的改革，解除管制與組織結構的重組改造，成爲此時間改革的重點。

1991 至 1993 年間瑞典發生了近 60 年來歷史上最爲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出現戰後首次的負成長，再加上世界經濟不景氣，人民改革的期望使得社民黨在 1994 年大選的得票率提升到 45.3%，重新獲得執政地位。2006 年九月以溫和黨爲主的中間偏右聯盟擊敗以社會民主黨爲主的中間偏左聯盟取得勝利，結束瑞典社會民主黨的 12 年執政，競選失敗的原因包括：失業率增加、失去工人階級的選票、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公共服務人員劇增、社民黨組織管理鬆散（林卡，2005；劉楓耘，2007）。

1977 年的改革，實際上顯現的是社民黨的意識型態——公平分配與平等，強調中央的管制以達成平等的目標。1993 年的政策走向強調解除管制與權力下放，削減公共開支，強調提升大學與大學學院的自主及使資源的運用更有效率，市場化的發展體現右派保守黨政府的意識型態。1994 年社民黨執政後，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又稍偏回中央管制的發展。2006 年的大選結果再度呈現一種向右轉的趨勢，由中間偏右的溫和黨聯合政府取得政權，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朝向更市場化的方向前進，解除管制、競爭、品質、效率、私有化成爲政策的重點，這個轉變也使得高等教育機構更爲依賴市場力量（Engwall, 2007）。

從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來分析，可以說高等教育的改革是政府用來解決失業與就業的手段之一。舉例來說，1990 年代初期的經濟危機導致就業市場的惡化，1990 至 1994 年間，就業人口約減少 50 多萬人，給薪工作人口比例也下降至 71%，失業率上升至 8%，1994 年後，由於政府所帶領啓動的成人教育及高等教育，新增許多的就業機會，失業率開始下降，到 2000 年底下降至 4%，達到政府的預期目標（鄭秉文譯，2003）。從 1977 年到 2006 年瑞典的政治發展來看，可以發現經濟的危機與失業率的增加是造成政黨輪替的主要原因，就業與失業問題是影響政黨能否獲取政權的關鍵因素。政黨的輪替也影響瑞典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一方面受到執政黨的意識型態的影響，另一方面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不穩定，促使政府意圖藉由高等教育改革來解決

社會與失業問題。

## （二）兼顧平等與就業的政策因素

瑞典是社會民主制福利國家的典型，其最突出的特點是將福利和勞動二者的融合，堅持三大相互關聯原則（鄭秉文譯，2003）：1. 社會服務、醫療保健服務和教育服務的增長與擴張；2. 最大限度的就業參與，尤其是婦女的就業參與；3. 持續的充分就業。上述原則在社會民主型的福利國家中是三位一體的。

社會民主式福利國家所強調的平等與就業也展現在瑞典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上。1977 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其中最重要的變革之一，即是將大學課程分成五個主要的職業群組，由中央建立一套學習方針系統，以提供學生更符合勞動力市場需求的技能，主要目的在使學生為就業作準備。1993 年的改革指出，由於中央計畫的課程被視為是造成瑞典勞動力競爭能力低的因素，於是廢止中央負責課程監控的單位，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是促使高等教育機構所提供的課程能符合學生的需求，政府強調高等教育機構所提供的課程應與勞動市場所需求的一致。2004 年的改革，政府強調高等教育機構應具有國際的開放性，為使瑞典更具有國際競爭力與改變勞動市場，以符合知識社會的需求，應培養更有能力的勞動力。2009 年政府所公布的法案中重要的項目之一是賦予高等教育機構能自主依照學生與勞動市場的需求提供課程，政府認為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將使高等教育更能回應社會的發展，且有助於大學活動品質的提升，俾使大學在國際活動上更具競爭力。

從委員會的代表席次也可以發現瑞典對勞動力市場的重視，舉例來說，1960 與 1970 年代社團組織（工會代表、企業領導者、地方政府官員）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角色是明顯的，此時期瑞典國家勞動市場委員會（the National Swedish Labour Market board）在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占有特殊的角色。充分就業與最大限度的就業參與，是社會民主體制福利國家堅持的原則，此原則也顯現在高等教育政策上，福利國家的目標即在連結高等教育與工作，因此瑞典所有主要的工會在各種委員會中皆占有席次，高等教育被視為提供就業與社會均等的工具，「就業」一直是瑞典高等教育政策中重要的項目，掌握高等教育機構與勞動力市場及就業間的關係，是瑞典教育部最重要的工作項

目之一。

開創瑞典模式的社民黨之主要目的在尋求促進最高平等標準的福利國家，平等的追求也不斷地呈現在瑞典高等教育的政策。在入學機會上，瑞典政府強調知識應開放給所有人，致力於擴大參與率與入學率；從地理的分布上，在瑞典各地皆設立高等教育機構，亟力消除因位置所帶來的不公平。舉例來說，1977 年的政策目標強調公平分配，期望能提供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有公平就讀高等教育的機會，但由於實施後產生相反的效果，新的高等教育體制受到強烈的批評，也使得當時執政黨在 1980 年的選舉失利。瑞典政府於 2001 年《開放的大學法案》（The open university）中聲明，不論背景、種族、居住位置或殘疾，所有人都能獲得接受知識與發展的機會，瑞典的高等教育應反映社會漸增的多元性。基於此目的，政府提出擴大不同社經背景學生參與的方法（OECD, 2006）。根據瑞典教育部的統計，從 1993/1994 年迄今，18-34 歲年齡群就讀大學的比例，勞工階級背景父母的比例從 18% 上升到 24%，父母為較高社經背景的學生比例從 33% 下降到 28%；2004 年女性就讀大學與研究所的比例為 60%，攻讀博士學位的女性占 47%（OECD, 2008）。即使在九〇年代後，經濟的惡化導致瑞典福利國家在財務上產生困境，迫使政府必須削減公共開支，實行私有化政策，政策朝右轉向，以增強經濟競爭力的自由主義社會政策，但瑞典原福利國家所追求的平等價值與觀念仍持續存在，也一直是教育政策制定的重點。

### （三）全球化市場化的經濟因素

傳統上瑞典的高等教育公共決策受到國會的導引且直接受到政府的指示，很多科學與文化公共機構，包括大學，受到政府與國會所賦予的高度自主性，仍維持其工部門的身分。高等教育系統包含在瑞典的福利國家體制內，這意謂著高等教育機構不管在組織與功能皆被視為中央政府機關的一部分，沒有政府的核准即無法簽訂任何的協議，也無法以大學的身分行使任何法律行爲。瑞典政府在高等教育政策上占有主導地位，政府制定很多重要領域的決策，包括終身聘僱，課程取向、設備建置、學生入學及課程訓練的規劃，大學董事會的任務在執行中央決定的目標以及管理資源的分配，即使是大學校長也由政府

聘雇。

198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新公共管理運動、以及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脈絡下，世界各國高等教育進行程度不一的改革，這股改革的浪潮可稱之為高等教育的市場化（marketization）（Williams, 1995）。19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針對高等教育所進行的改革，藉由市場化概念的引入，藉由放鬆對高等教育在程序上與實質上的管制、以及私有化與準市場機制等途徑，意圖使高等教育機構達到擴大經濟規模、提升效率與效能、改善品質、促進多樣化、刺激競爭等目的。瑞典高等教育也受到這股力量的影響。

從瑞典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分析可以發現，政府逐步放鬆了對高等教育機構的管制，例如：1988年通過新的預算法案，實施3年1期的預算核撥，依照大學與大學學院的全職學生數與年度學習成果核撥經費，傳統以支出為基準的核撥方式改為以績效為主的分配系統，高等教育機構有權決定校內人事的配置與聘僱。除了經費、人事等程序上的解除管制，政府也放鬆課程規定與治理決策等實質上的管制，例如：1970年代，高等教育系統包含在瑞典的福利國家體制內，這可顯現在大學教育被分成五個主要的職業群組，學習方針系統（study-line system）主要為學生就業作準備，1990年代初期這個系統被新的學位系統所取代。另外為了使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有更緊密的聯結，鼓勵高等教育機構提供更多各式短期的專業課程，為了吸引國際留學生，鼓勵大學開設英語授課的課程。

全球化與市場化也帶來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改變。傳統上瑞典的高等教育被視為公家機關的一部分，政策的走向大部分由中央政府機關所決定，機構領導者所能發揮的能力是很微弱的。1980年代為回應日漸困難的經濟情況，管理朝向一種目標管理哲學的去中心化政策。1990年代初期，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影響保守黨政府對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強調品質與效率的控制、機構間的競爭、強力的機構領導能力。1991-1994年保守黨聯合政府加速公部門的轉型，也將此理念運用在高等教育部門。高等教育系統從長久以來一致、公共、中央管制的體系，轉變成較自主、自我管制的治理模式。

瑞典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上的轉變也可從機構領導階層權力的增強

來說明。1977 年高等教育的改革，使外部利益組織代表，例如大型貿易協會、較低層級的學術部門成員、學生團體，在決策委員會中獲得代表席次，這削減了學校教師的權力。1983 年通過治理委員會 1/3 成員為政府聘任的外部代表的政策，機構面對外部逐漸增加的影響。1993 年的改革，保守黨聯合政府藉由反對其在大學委員會的位置，限制這些外部成員的影響力。1991-1993 年的改革結果，個別機構與領導者的角色似乎被強化，在改革的討論協商過程，由教育部主導的聽證會目的是為了直接採取來自學術成員的建議，很多新的責任也下放給機構的管理者。自主被重新定義為機構領導者的價值取向（Kogan et al., 2006）。大學治理委員會的權力與外部代表的比例增加是治理上最主要的特性。學生數量擴張、經費刪減、對外部經費的依賴，皆驅策機構領導者變成機構的發言人與經紀人，校長從學術領導者的角色轉變成為機構的管理者。瑞典大學校長必須塑造新的學術領導型式，對機構首長而言，最主要的挑戰在於確管理上的績效表現與學術社群間的平衡。

治理模式的改變也趨使機構對於強化中央行政管理能力的需求逐漸增加，有些機構領導者開始建立管理團隊、增加副校長與專業副校長的職位、設置專業諮詢顧問小組。政府對績效責任、評鑑、效率的強調加重機構的責任，使管理工作也變得更加複雜且具挑戰性。為回應政策對績效責任、評鑑、品質與效率的強調，校內特殊支援單位（special support units）的成立成為一股趨勢，例如：教育/學習中心、研究政策中心、品質發展中心、評鑑中心、公共事務處理中心等單位的成立。除了校內支援單位外，外在的資助者也有在高等教育機構內成立新單位的趨勢，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機構本身對外部研究資源的興趣，另一方面也是大學想藉由這些單位的運作以自行運用這些外部的研究資金（Sjölund, 1999）。

中央官僚管理職權的改變，強調績效責任的管理，而不是計畫式的管理，使得管理權力從中央官僚轉移至個別機構。大學董事會的任務也隨著政策的發展開始改變，1970 年代其主要任務在於執行中央決定的目標，以及管理資源的分配，現在高等教育機構的自主權逐漸提高，大學校長可以決定管理職務的組成，長程策略計畫成為校長領導

團隊最重要的任務。1990年代初期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引進新的資源分配系統，大學校院必須在招生上相互競爭，但員額分配仍由政府管控，經費的分配不只以大學的入學率為基礎，也根據學生的學期表現成果。瑞典的高等教育系統從國家功利主義的治理型式，朝向市場導向的治理型式。

從高等教育的目的來看，1990年代高等教育目的轉變為強調符合知識社會的需求，而不是狹窄地限於勞力市場的需要，以往期望由高等教育來改革社會的目的，轉變為強調各種市場的需求與學術卓越的追求。從政策的發展也可以發現，學生、社區與企業等消費者的需求成為高等教育政策的重點，高等教育的角色從供應者導向（supply-driven）轉變成為需求導向（need-driven）（OECD, 2006）。瑞典高等教育也不再像 Williams（1995）所指，由政府扮演供應者的角色，朝向支持消費者或代理消費者的角色。

## 二、結論

二次戰後，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受到各式不同因素的影響而開始轉變。1960年代後期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是促使世界各國高等教育轉變的主要原因。1980年代新右派的快速推展以及經濟全球化，導致福利國家減少社會支出的呼聲日益高漲，在過去的20年裡，尤其在九〇年代，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相繼採取一系列對福利國家和社會保障政策進行改良和改革，這個浪潮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減少福利成本與削減福利標準成為大部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政策調整與改革的方向，以「從搖籃到墳墓」都有全面社會照顧制度的瑞典也無法避開這些浪潮。1960年代瑞典高等教育開始受到擴張所帶來的影響，高等教育從菁英型開始轉向大眾型。經濟壓力與學生需求的擴增對高等教育的品質、資源運用效益與基本價值帶來威脅，績效責任的要求也對高等教育帶來壓力，這股對高等教育的社會與經濟期望，轉變了傳統大學與國家間的關係，使瑞典這個社會民主型典範的福利國家受到挑戰。

高等教育如何在固定單位成本回應學生與社會的需求，成為瑞典政府第一個需要考量的問題。1960與1970年代面對高等教育擴張所

帶來質量問題，瑞典發展出較為中央化的政策，將高等教育系統整合模式變成單一體統，採取更為職業導向的課程，意圖強化高等教育的管理來解決。1980 年代，瑞典雖然受到經濟與國際情況的影響，開始接受自由化與私有化的改革理念，但基本上對國家福利體制仍滿意，大部分仍反對以市場導向的自由主義福利觀念，認為自由主義的社會政策會把人民引向自私。但由於從福特主義轉向後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改變、私有化趨勢使得政策向資產階級的利益傾斜，加上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國的影響，瑞典的政策開始緩慢地向自由主義的方向前進，雖然這些現象仍不明顯，直到 1990 年代，瑞典藉由機構強力領導的運作與法令的放寬，解除管制成爲重要的改革要項，提高機構的自主，強調品質與績效責任遂成爲政策的重點。

相較於英國、美國、澳洲等其它國家高等教育在 1980 年代的市場化發展，瑞典高等教育的市場化發展不僅起步比較晚，且速度也比較慢。從 1990 年代後，政府才逐步解除高等教育的管制。私有化顯現在學費與研究的政策上：以學費來說，英美澳各國早已開始收取大學學費，大學教育在瑞典仍屬於社會福利的措施，但從 2011 年開始，非瑞典與歐盟國家的學生須開始繳納學費。另外，高等教育研究經費主要原來自國家的補助，1990 年代保守黨聯合政府運用工薪者基金（wage-earner funds）成立 11 個私立研究基金會（private research foundations），包括環境研究基金會、知識與技能發展基金會、策略性研究基金會等。這些私人基金會的成立使得國家直接補助的研究經費大幅縮減，1980 年代約有 66% 的研究經費來自政府補助，到 2002 年已下降至 45%（Sarback, 2004）。

由瑞典的高等教育政策來看，政府並沒有完全解除對高等教育的所有管制，即政府管制下的解除管制，舉例來說，瑞典政府一方面賦予機構自行分配經費與課程設置的權力，另一方面也實施品質管控措施，要求每個機構須制定內部的品質管控計畫，每年須呈報年度成果報告，對財務與課程品質負起更大的績效責任。此外，政府雖然放鬆對高等教育機構內人事聘僱的管制，即大學校長可以決定管理職務的組成及教師的聘用，但具有決定高等教育機構運作的董事會成員，包括：外部成員、學生、教師等，其代表席次比例仍掌控在政府手裡，

董事會主席與校長的聘僱權也仍由政府決定，此顯現瑞典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解除管制仍維持在政府的框架。此外，1990年代以降，瑞典政府雖然在經費與課程等方面下放給大學新的自主，仍以品質之名賦予新的責任與管控，一方面藉由6年1期的教育課程審核，以確保各教育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則根據學生的數量與研究資源，作為經費分配的基準，控制方式從管制朝向一種強制性的績效控制。如何因應全球經濟的轉化是福利國家改革的重點。由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是主要的變化趨勢，因此主要福利國家改革大體上呈現自由化和國家解除管制的方向，但改革路徑仍受到各國歷史制度脈絡以及社會文化的不同所影響。瑞典改革轉向活絡勞動力市場和性別平等化，支持大學應脫離國家掌控，提倡大學在品質掌控的自主。由瑞典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可以發現，雖然瑞典也無法避免市場化的潮流，以因應外部環境變遷，但瑞典原有福利國家的價值仍如同其對平等的追求與就業的承諾觀念持續存在。

臺灣的高等教育在解嚴之後，學生人數快速擴充，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大學教育的改革也開始出現一股市場化的走向。教育部在2001年教育檢討改革與改進會議中，關於高等教育部分的建議事項包括使國立大學儘速法人化、鬆綁人事和會計制度、增進大學人員聘任、升等、待遇、產學合作等人事制度之彈性、推動大學校院整合、研定大學教師獎勵及誘因措施，提高教師教學及研究水準、推動大學評鑑制度，有效提高教育品質、合理分配教育資源，提高大學經營管理績效、提高大學國際競爭力、建立技職校院與產業夥伴關係（教育部，2001）。2003年教育部所發表的《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規劃研究專案報告》，提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規劃與改進方向，包括高等教育學校分類與定位、公立大學法人化、人事會計制度的再鬆綁、引進民間資源強化產學合作、加強人力資源供需研究、提升高教國際競爭力（教育部，2003）。這些強調鬆綁、經濟規模、競爭、品質、私有化的政策的走向，顯現我國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的導向。依循市場邏輯的發展，自由化與市場化的發展可能產生的弊病包括造成教育機會不均、競爭性獎助機制造成的M型化、教育品質管控等，如何兼顧公平與效率是高等教育走向市場化路程中必須考量的問題。我國和瑞

典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時間與步伐多有相似，瑞典在高等教育的發展上，雖然政策的走向逐漸從社會民主主義走向解除管制與新自由主義路徑，但其社會民主制度的福利價值仍舊根植於高等教育體系中，尤其現在世界各國面臨經濟危機與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困境，瑞典兼顧就業與均等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

## 參考文獻

- 王云龍、陳界、胡鵬（2010）。**福利國家：歐洲再現代化的經歷與經驗**。北京市：北京大學。〔Wang, Y. L., Chen, C., & Hu, P. (2010). *The welfare state: Europe and then the modern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林卡（2005）。論北歐學者對於其福利國家體制的研究、論爭及其論爭的邏輯基礎。**國外社會科學**，6，46-53。〔Lin, K. (2005). On the logical basis of Nordic scholars for research, debate and the controversy of the welfare state system. *Foreign Social Sciences*, 6, 46-53.〕
- 林萬億（1994）。**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臺北市：巨流。〔Lin, W. Y. (1994). *Welfare stat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istory*. Taipei: Juliu.〕
- 徐崇溫（2007）。瑞典模式的歷史演進和經驗教訓。**復旦學報**，4，15-24。〔Xu, C. W. (2007).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wedish model and lessons learned. *Fudan University*, 4, 15-24.〕
- 教育部（2001）。**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取自 <http://history.moe.gov.tw/important.asp?id=37>〔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1).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white paper*. Retrieved from <http://history.moe.gov.tw/important.asp?id=37>〕
- 教育部（2003）。**全國教育發展會議**。取自 <http://www.edu.tw/secretary/2003/discuss/1102.htm>〔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3). *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onfere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u>.〕

- tw/secretary/2003/discuss/1102.htm ]
- 劉楓耘 (2007)。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的執政特點。北京教育學院學報, 21 (1), 34-38。 [ Liu, F. Y. (2007). The ru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1(1), 34-38. ]
- 鄭秉文 (譯) (2003)。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 (原作者: Gosta Esping-Andersen)。北京市: 法律出版社。 [ Esping-Andersen, G. (2003).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B. W. Zheng, Trans.). Beijing: Law Press. ]
- Bauer, M., & Henkel, M. (1999). Academic responses to quality reforms in higher education: England and Sweden compared. In M. Henkel & B. Little (Eds.), *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pp. 236-262).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 Deen, J. (2007). *Higher education in Sweden*. Retrieved from [http://www.utwente.nl/cheps/higher\\_education\\_monitor](http://www.utwente.nl/cheps/higher_education_monitor)
- Engwall, L. (2007). Universities,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Changing patterns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Sweden and beyond.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19(3), 87-104.
- Esping-Andersen, G. (1996). After the golden age? Welfare state dilemmas in a global economy. In Esping-Anderson, G. (Ed.),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y* (p. 1-31). London: SAGE.
- Eurydice (2009). *The information database on education systems in Europe: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Sweden 2007/2008*. Retrieved from <http://eacea.ec.europa.eu/>
- Högskoleverket (2009a). *Swedish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colleges short version of annual report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hsv.se/>
- Högskoleverket (2009b).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Sweden*.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hsv.se/>
- Kogan, M., Bauer, M., Bleiklie, I., & Henkel, M. (2006). *Transforming higher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 Niklasson, L. (1996). Game-like regulation of universities: Will the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Sweden work? *Higher Education*, 32, 267-282.
-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09). *Knowledge without borders-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sweden.gov.se/>
-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0). *Academia for this day and age*. Retrieved from <http://www.sweden.gov.se/>
- OECD. (2006). *OECD thematic review of tertiary education: Country background report for Swede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edu/>
- OECD. (2008).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08: OECD briefing note for Swede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edu/eag2008>
- Premfors, R. I. T. (1979).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weden: recent developments 1976-78.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4(1), 81-106.
- Sander, G. F. (1992). Sweden's government loosens the reins on tightly controlled university system.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39(7), A36.
- Sarbäck, S. (2004).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in HEIs: Swede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
- Sjölund, M. (1999).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research funding. In M. Henkel & B. Little (Eds.), *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pp. 204-218).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 Sörlin, S. (2007). Funding diversity: Performance-based funding regimes as drivers of differenti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0, 413-440.
- Stephens, J. H. (1996). The Scandinavian welfare states: Achievements, crisis, and prospects. In G. Esping-Anderson (Ed.),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y* (pp. 32-65).

London: SAGE.

Svensson, L. (1982). The state and higher education: A sociological critique from Sweden.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7(3), 295-306.

Teichler, U. (1999). Higher education and changing job requirements: A comparative view. In M. Henkel & B. Little (Eds.), *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pp. 69-89).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Williams, G. (1995). The “marke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 and potential reforms in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In D. D. Dill & B. Sporn (Eds.), *Emerging patterns of social demand and university reform: Though a glass darkly* (pp. 170-193). Oxford: Pergamon Press.

